



Mudan de Jingshen Jiegou yu  
Xiandaixing Wenti

# 穆旦的精神结构与 现代性问题

段从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获四川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Mudan de Jingshen Jiegou yu  
Xiandaixing Wenti

# 穆旦的精神结构与 现代性问题

段从学 著

人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段从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  
ISBN 978-7-01-013722-3

I. ①穆… II. ①段… III. ①穆旦(1918~1977)—诗歌研究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928 号



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

MUDAN DE JINGSHEN JIEGOU YU XIANDAIXING WENTI

段从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3722-3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序：“大诗学”与现代性困境中的穆旦问题

姜 涛

夸张一点说,某一研究领域的可能水准,往往与特定对象的难度和深度相关。对于新诗研究这个行当来说,穆旦似乎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丛簇的“结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诗内部交织的紧张、呈现的复杂性,以及遭遇的困境,都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即便经过了过度的言说,其形象或许早已被“透支”,对于有抱负的研究者而言,穆旦仍是一个极具生产性和挑战性的话题,关键在于怎样重构思考的视野、方法。老段(段从学)的穆旦研究起步很早,十多年以来,精彩的阐发就接连不断,至今也积累了不少代表性的成果。因而,这部专著让人期待已久,本该早就拿出的,但也许是作者的学术兴趣实在宽广,多年来南北驱驰,开疆扩土,穆旦研究倒像自家后院,一直无暇进一步打理。再或者,他用心深透,知道自己话题的分量,并不特别在意拿出时间的早晚,更无心在学术生产的链条上完成所谓“突破”、“超越”、“填补空白”之类。往来邮件中,作者坦言这部书稿包含了一种自我清理的意味,这其实是一种相对从容的心态,既不为自己过往的成绩所限,更是可以跳脱出一般的研究轨范。

刚才说到穆旦形象的“透支”,只要对这个话题有所关切,就不难感受这一点。简言之,自20世纪80开始,“现代主义”似乎是新诗研究唯一重要的话题,穆旦在很大程度上也当作现代主义或新诗现代性的“英雄”来看待,相关论者多热衷挖掘诗人作品中的诸般“现代”指标,20世纪英美诗歌的经典谱系,则是基本的辨识参照系。另一思路有所不同,着力从穆旦的诗作中提炼、升华若干玄学命题,进行思想的、哲学的、宗教的阐释。类似读解极大扩张了诗人写作的思想意蕴,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和文脉,“断章取义”式的玄学思辨,也可能有失分寸,只是做到表面高深的程度。新世纪之交,上述两种讨论已趋于饱和,且愈发显出刻意、封闭的一面。为了反拨认识惯

性,破除固化的“英雄”形象,也有论者对穆旦的写作资源和他所代表的新诗方式提出尖锐批评。由于结合了非常具体的诗歌对读、分析,并暗中呼应了流行的文化政治,这种批评颇具说服力和事件性,也引发了持续的讨论,但无论“中国性”之是非,还是“奥登风”之真伪,都有可能陷入辩难的圈套,对于穆旦的认识,反而没有更多的推进。

针对上述状况,老段几年前曾有《回到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文,强调应从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这个支配性思路中解放出来,回到穆旦自身,在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认识和理解穆旦。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和课题,如穆旦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关系,如怎样用旁证材料还原穆旦置身的历史情境,这些建议在今天看来,仍切实可行,有深入展开的必要。当然,近年来穆旦研究也打开了一些新局面,特别是年谱、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佚文的发掘,相关版本的考查比较,都为认识穆旦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依个人一偏之见,穆旦讨论如要激发持续的活力,如何使穆旦“再问题化”与“再历史化”,或许是两个值得考虑的方案。所谓“再问题化”,意味着绕开一般固化的文学史框架,在得失毁誉的评断之外,更多关注穆旦写作中的困境、挫败、乃至无法突破的限制,并尝试在文学、思想、政治的重叠“场域”去理解这些难题;所谓“再历史化”,则意味着打破整体化、静态化的分析方法,将穆旦的写作当作一个充满差异的动态过程,在具体变动的现实关联中去揭示其面对的压力和选择的姿态。这与“回到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提法,实际没太大的差异,如能两相配合,彼此推动,某种尚不十分明朗的前景,或许能由此被窥见。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眼前的这部穆旦专著,又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全书五章分别对应了穆旦不同的写作阶段,从早期作品经验模式的确立,到晚年“冬之乐趣”的发现。然而,全书的意图显然不在评传式的考察,时间线索也只是表面的连缀,贯穿各章的是这样一个总体性命题:现代性困境的生成及突破。跳出现代性的“装置”,将“现代性”本身当作质询的对象,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穆旦的写作并不因发生于特定的中国情境,就外在于这一普遍的前提性“困境”,恰恰由于其剧烈地投入虚无的现代深渊,而成为思考这一“困境”的极有意味的个案。诚然,沿袭某种北美的学术理路,“反思现代性”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早已演成一种熟(俗)套,但老段依托的学术视野无疑远为宏阔。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基督教“神义论”向现代“人义

论”转化的宏大框架中,在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的思想纵深中,去检讨由“主体性迷思”而导致“纯洁的个人”与“丑恶的社会”的循环对峙——这一现代“囚徒困境”的生成和诸种表现。有关穆旦的分析、比较、辩难,在此总体命题的统摄下,由是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串联各章的时间线索,也包含一种思辨逻辑的强力展开:从早期穆旦“异己性”世界体验写起,随后辨析了他对战争、国家的态度,以及历史情境中的自我挣扎,时间轴线上的内在冲突,最后止于诗人晚年精神结构的重建,其中不难读出一条从缘起、到展开,再到自我与世界和解的精神史轨迹。

很显然,这部书稿突破了惯常的新诗乃至文学研究的轨范,不再纠结风格、“主义”的辨析,也不拘泥于实证性的历史考察,而是不断回到根源,将穆旦的写作当作一个现代性“难题”,充分地使其“再问题化”了。所谓“个人的清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雄心的显现,而“清理”的工作又似乎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其一,是穆旦文学历程的整体考察,在这方面老段有多年积累,功力深厚,对于相关话题驾轻就熟,可以自如穿插、开展;其二,是“现代”与“反现代”思想资源的梳理、整合,对于康德、黑格尔、尼采、舍勒、海德格尔、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的广泛征引、评述,就构成了全书推进的中心骨干。前者,构成了进入问题的“窄门”;后者,无疑提供了烛照的视野,不仅现代的“囚徒困境”被一再提出,对于理性神话、历史进步论,必然性“铁律”的检讨,在书中也相继展开。用个不一定准确的比喻,作者仿佛是要将两部不同的书塞进同一部中,让它们剧烈地碰撞、化合,激发出更大的阐释空间。这也带来一种不断回旋开展的论述策略,无论谈及诗人的影响和接受,还是就具体诗作进行讨论,他时刻保持一种反身、回溯的状态,不断回到思想史的纵深中,不断将文学问题提升至更普遍、也更峻急的精神层面。

作为读者,相信也会时刻感受到“诗”与“思”之间的纠缠、撕扯、鏖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密不透风的紧张思辨。当然,要做到内在的协调、贯通,并非易事,书中部分段落对于西方启蒙思想传统的辨析,就可能稍显缠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穆旦的论述空间。这也解释了附录中有关浪漫主义历史形态和思想“根源”的讨论,并非可有可无的陪衬——“反思现代性透视装置,与反思浪漫主义,乃是同一回事”。这部分看似与穆旦无关,但恰恰由于更完整地展示了“反思”的面向,也就构成了全书思路的一种内在参照。就我

个人的阅读而言,感觉写得最为酣畅、饱满的是第二章。这一章处理的是抗战初期穆旦对于战争、民族国家的态度,当然不是一般性地陈说战争爆发带来的集体兴奋,如何感染了年轻的诗人,在迁徙变动中穆旦又是如何形成新的历史视野,如何自觉追求“新的抒情”、渴望投身于大的时代等。在这个段落中,作者还是着眼于内部的精神结构,分梳了“与‘旧世界’决裂”和“拥抱‘新时代’”这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意识,怎样交错激荡,塑造了穆旦抗战初期独特的诗歌景观。

更为重要的是,在两种意识的作用下,作者进一步指出“转变”、“突破”背后更复杂的逻辑:在战争以及自然野力的召唤下,穆旦越是突破原有的封闭自我,努力突入到外部世界中,他越是更深地卷入困境之中。其中,有关“三千里步行”途中“风景”与主体位置的辨析,尤其值得重视:

可以说,南方自由而阔大的原野越是显现为穆旦眼中的“风景”,则诗人也就更加隐蔽而深入地固置到作为“看风景的人”的主体性地位上,亦即越强烈地深入到浪漫主义诗歌文化的核心,深入到他任性而专横的“自我”意识内部,越加无视真实的外部世界,越加把“风景”看作是“风景”。两者互为因果循环,交互作用,把行走在原野上的诗人,牢牢地枷锁在了现代性生存论装置里。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并非如常人所说的那样,打破了穆旦的浪漫主义“玫瑰梦”,让诗人看见了中国社会现实,回到“真实”的现实主义场域中。

依照惯常的理解,经过了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穆旦的诗歌意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在上面的剖析中,“风景”并没有让穆旦从浪漫主义的主体位置上解脱出来,反而让他在“看风景”的过程中,更为内在地被浪漫的主体性逻辑所支配。这种剖析似乎在理论上回应了阿垅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观感,对于穆旦此一阶段写作,阿垅的判断是:就战争而言,穆旦“仿佛是一个外来的人,一个偶然的加入者”。(阿垅:《〈旗〉片论》)沿了这一判断思考,不仅可以触及现代性的主体困境,穆旦所代表的一类现代诗人可能的历史身份、位置,在具体的“战时”情境中,也还有进一步探询的可能。或许可以说,这一章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重新揭示内与外、主与客、“应在”与“实在”等一系列二元冲突,而是在理论、历史和文本之间形成了内在贯通和推



进,非常动态、开放地呈现出20世纪40年代前后诗人之历史姿态在诗作中的表现。如果没有对浪漫主体的思考,就无法对“风景”作出有说服力的解读,如果没有对作品的熟练掌握,对浪漫主体内涵的认识就不可能被深化。

由于相当深入地涉及现代思想的诸多核心命题,除了理论与历史、“诗”与“思”之间的紧张角力,这部书稿可以讨论的地方,相信还有很多。至少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引发争议,涉及整体的论述思路、方法和判断,这里不妨简要述之。首先,全书采用一种总体性视角,将“现代性”及其困境的发生作为一个普遍进程,基督教传统内部从“神义论”到“人义论”的转变,则构成了“发生”的大前提。虽然作者也强调,穆旦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其精神冲突与传统世界消亡后的“文化失范”相关,并不外在于上述普遍的逻辑。但“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毕竟包含了特殊的上下文关系,“个人的发现”所导致的文化与伦理症候,同“神义论”与“人义论”的紧张并不对称,不断回到现代性生成的根源,有时难免也会稀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另外,置身特定的“战时中国”情境,穆旦的写作体现了现代性困境,同时又和民族救亡、个体改造、战争正义、和平与民主的诉求等一系列话题紧密相关,现代性问题的框架是否过于“粗大”,能否非常完整、深入地解读穆旦,或许是一个疑问。

简言之,上述疑问指向了“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把握。与此相关,穆旦置身其中的现代性困境,在书中被概括为“纯洁的个人”与“丑恶的社会”之对峙所形成的“囚徒困境”,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二元结构,如“理想我”与“现实我”、“世界之内”与“世界之外”、“应在”与“实在”、“生理之我”与“心理之我”等,也构成了一种封闭的“单调游戏”,穆旦的写作恰恰落入其中,无法挣脱这一悖论性的循环。上述二元结构的确强有力地说明了穆旦所代表的写作及与世界的关联方式的核心困境,但对相关二元结构的不断揭示,也会有不断自我重申乃至回收之感。从某个角度看,诗人自我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内在一起,但不同的历史时刻,具体的针对性、对话关系以及身份的选择却并不是单一的。仅就20世纪40年代而言,从抗战爆发,到进入僵持阶段,再到抗战结束、国共和谈以及内战爆发,从渴望自我更生的“小资”青年,到“偶然加入”战争又复员的军人,再到一个“惹事生非”的报纸主编,进而再到“良知良心”的自觉代言人,穆旦的写作策略、诗体意识乃至自我的设定,都有相应的变化。这样的过程及历史经验同



样值得去舒展回放,对于现代性困境的反复揭示,并不一定构成穆旦讨论的终点。

再有,究竟怎样看待以理性、主体、进步为内核的现代性规划?这倒不是为了讨论哈贝马斯一类的方案是否浅薄,或仅在理论层面更为辩证地“正反”把握,而是说跳出现代性“装置”的同时,其实也需要对反现代性的“装置”保持一定警惕。为了梳理现代性的思想谱系,作者引述了相当多的资源,由于个人学力、视野有限,对此不能进行更多的回应,但可以提出的是:现代性“困境”不单是某一总体结构和若干核心命题的反复演绎,而是涉及了非常宽广的社会结构、知识建制、文化方式的重新组织,尼采、舍勒、海德格尔、阿伦特等“大家”言说的思想历史脉络也各有不同,将如此庞杂的问题“塞入”穆旦的讨论中,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现代性问题本身可能会被抽象化、模式化。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诸种“现代”动力乃至革命的乌托邦愿景,虽然造成了诸多暴力和苦难,还是具有起码的正当性,创造“新世界”的想法也不单纯出自现代人的傲慢与偏执,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迫切的历史压力和危机感所致,并不简单如穆旦诗中所言:“‘必然’已经登场,让我们听它的剧情——/呵人性不变的表格,虽然填上新名字”。这其实只是一种相当浮泛的历史直观。而且,突破“困境”,打破现代“装置”的束缚,也不简单是诗人个体的选择、态度问题,因为这一现代“装置”的起源,无论中外,早已深深嵌入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中。

无论怎样,上述可能的争议,应当看作是穆旦被充分“再问题化”之后能量的释放,是“诗”、“思”、“史”之间相互卷入又相互角力的结果。有关穆旦研究的前景,上文胡乱提出了“再问题化”与“再历史化”两种可能。如果说在前一个向度上,老段已拓展了一个深广的空间;那么在后一个向度上,我倒是想拉杂作一点补充。具体说来,穆旦讨论之所以一度饱和,除了“现代主义”、“现代性”一类框架过于封闭外,一个颇为常见的讨论方式是,穆旦的写作更多地被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论者往往从某种预设的前提出发,从相关诗作和评论摘取若干段落、命题,进行演绎。虽然,有关诗人写作不同阶段的区别,也经常被提起,但大多指向一种线性的评传式呈现,而缺乏对不同历史状况中诗人写作具体的针对性、变动性和层次感的考察。正如上文所言,如果说“纯洁的个人”与“腐败的社会”之对立,构成了穆旦写作的基本结构,那么无论“内面化”的真纯个人,还是外部的民族国家、战争、时代,都

不是固化的、抽象的存在,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变动不居,诗歌写作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多种形态。细致地讨论这些变化的层次,目的并非仅在历史丰富性的呈现,或某种原初“现场”之返回,更重要的是,在特定情景中恢复一种内在的思考契机。所谓“同情的了解”不单指向历史客观之把握,而更多意味了对写作者心境、难题、及对突破限制之努力的了解,由此也不致将诸种事后“追溯”的立场特权化、结论化。

这里仅举一例,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写作风格和意识发生了微妙变化,写下了《旗》、《给战士》、《野外演习》等一批“抗战诗录”。不同于抗战初期对于“新的抒情”的雄健渴望,也不同于抗战中期立足于个体生存困境的玄学思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具有某种“时事性”,“伪奥登风”的使用也十分明显。暂不论这批作品在美学上“平庸”与否,在终战前后大后方政治抒情诗、讽刺诗勃兴的氛围中,穆旦对于某种“时事”、“时感”类诗体重塑的意图,或许可以窥见一些端倪。与此相关的是,陷入“囚徒困境”的纯洁个人,也逐渐与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重合,换言之,1945年之后的穆旦不仅站在“世界之外”保持对战争的人性的、玄学的关照,同时也更多从一种“在地”的视角出发,去表达对战后中国历史走向的隐忧和思考。这种“时事性”风格一直贯穿了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写作,并且与寻求和平、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等一系列命题息息相关。像书中多次引述的组诗《时感》,恰恰写于内战全面爆发的1947年1月,即如袁可嘉当时所言:“这首短诗所表达的是最现实不过,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沉痛心情”。其中,“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并不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而暗中对应于内战时期所谓的“中间势力”,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袁可嘉最为推崇的“希望”与“绝望”的相互环锁、渗透展开,也不止抽象地传达了对进步历史观的质疑,而是非常具体地与现代中国内部历史困局的感受相关:正在发生的内战是否只是巨人玩火游戏形成的“周期性的风命悲剧”(沈从文)?是否只是一种“无主”暴力(梁漱溟)的循环?无论战争的结果怎样,国家民族能否挣脱由新生到腐败的历史“周期率”(黄炎培)?要回应这样的问题,需要政治的判断,也需要敏锐开阔的思想洞察,自由知识分子历史思考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也由此被检验。依照老段提出的方法,以旁证材料还原历史情境,不仅可以了解穆旦写作的背景,同时也可以将他在诗歌中遭遇的困境转化为一个思想史的困境。

概言之,“再历史化”与“再问题化”,在根本上不是彼此分立的两个向度,“小处敏感”恰恰指向了“大处关怀”。前段时间,在与周边友人的讨论中,老段曾针对新诗研究的局促、封闭,提出一种“大诗学”的构想,以区别于以诗歌这一特殊文类为对象的“小诗学”。所谓“大诗学”,应该超越现有的学科限制,以诗歌讨论为进路,与世界、与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发生联系,进而朝向一种广泛的“思”。打破有形的现代学术体制,这是“大诗学”之为大的一个方面,而跳出现代性“装置”来思考“现代”,保持对无形的思想机制的警惕和反省,则是“大”的另一种表现。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书稿虽以穆旦为题,但显然贯彻了“大诗学”的构想,在方法上,因而具有了一种实验的意味。但呼唤“大诗学”,破除“小诗学”的限制,在我的理解中,并非是要用思想研究、历史研究,替代传统的诗歌研究,从一种学术格式转换到一种格式,而是希望能在大与小、内与外、“诗”与“思”与“史”之间形成一种开阔而又内在的动态分析视野,不断将外部问题转化为诗的内部问题,也不断能从诗的内部、从特殊的历史与美学状况中提出重大的思想课题。老实说,由于文体本身的特殊性,现代诗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其承载有限,只有在研究的方法、意识、框架等前提上,有所思考、筹划、乃至决断,在这个行当中“混过”的朋友们,也才有了继续留驻并进一步投入热情的理由。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我”的形成 .....               | (1)   |
| 第一节 黑夜意象与现代性生存困境 .....         | (1)   |
| 第二节 个体境遇与普遍历史危机 .....          | (3)   |
| 第三节 现代诗风的本土资源 .....            | (8)   |
| 第四节 世界根据的转向与“自我”的发明 .....      | (14)  |
| 第五节 个人权利与民族要求的分裂 .....         | (19)  |
| 第二章 国家认同与诗风之变 .....            | (29)  |
| 第一节 浪漫主义诗歌文化的影响 .....          | (30)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的个人化认同 .....           | (39)  |
| 第三节 “风景的发现”与“自我”的确立 .....      | (42)  |
| 第四节 主体的“内部争吵”与艾略特式的“现代派” ..... | (53)  |
| 第三章 现代性荒野上的被围者 .....           | (67)  |
| 第一节 自我与主体之间的结构性断裂 .....        | (67)  |
| 第二节 共时性结构冲突的历史表达 .....         | (71)  |
| 第三节 受难的诱惑与限度 .....             | (75)  |
| 第四节 “被围者”的精神结构与历史困境 .....      | (81)  |
| 第四章 时间激流里的挣扎 .....             | (91)  |
| 第一节 历史规律的“根源” .....            | (92)  |
| 第二节 历史时间里的“生理的自我” .....        | (101) |
| 第三节 “必然规律”中的“有限自我” .....       | (106) |
| 第四节 “可能的生活”对抗“正确的知识” .....     | (112) |

|                           |       |
|---------------------------|-------|
| 第五节 作为虚无主义的“理性” .....     | (127) |
| 第六节 在时间的火焰中发现“我的影子” ..... | (142) |
| 第五章 在冬天的旷野上书写真实的自我 .....  | (153) |
| 第一节 重返理想与现实“之间” .....     | (154) |
| 第二节 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小小争吵 .....    | (160) |
| 第三节 “普通生活”的真实性 .....      | (164) |
| 第四节 直面人性的软弱以拒绝欺骗 .....    | (170) |
| 第五节 “冬天意识”与个人生存的真实性 ..... | (174) |
| 第六节 未完成的“真实生活” .....      | (179) |
| 附录 浪漫主义的历史形态与思想“根源” ..... | (184) |
| 参考文献 .....                | (210) |
| 后记 .....                  | (216) |

## 第一章 “我”的形成

早在1934年,穆旦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当时,名叫查良铮的诗人,还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作品大多发表在《南开高中生》上。但在诗人自己编定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中,开篇的却是1937年11月的《野兽》。自费印行的《穆旦诗集(1939—1945)》,干脆不收1939年前的作品。

这种安排,显然包含了穆旦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态度:它们是不成熟的。但对探讨穆旦的生命意识与自我形象来说,这些作品的地位不仅极其重要,而且不可代替。唯其不成熟,它们才直接而源始地袒露了诗人最初的自我意识和他面对世界的奠基性态度。

### 第一节 黑夜意象与现代性生存困境

在穆旦这些早期作品中,黑夜始终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核心的意象,黑暗则是现实世界的基本底色。《夏夜》和《冬夜》是直接写黑夜的。在《夏夜》中,一切都是“黑暗,寂静”的,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窒闷。《冬夜》里同样弥漫着浓重的死寂:

夜,不知在什么时候现出了死静,  
风沙在院子里卷起来了;  
脑中模糊地映过一片阴暗的往事,  
远处,有凄恻而尖锐的叫卖声。

以黑暗或夜为背景者,则有《更夫》、《一个老木匠》、《古墙》和散文诗《梦》。在《更夫》中,包围着寂寞的更夫的是寒冷而死寂的冬夜,在《古墙》中,眼前是在风沙中剥落着的荒凉的古墙,远处则是西下的夕阳和越来越庞大的“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辉”。而在《一个老木匠》中,黑夜又是一种毁灭

性的力量,反衬着老人的生命之刚强:

沉夜,摆出一条漆黑的街  
振出老人的工作声音更为洪响。  
从街头处吹过一阵严肃的夜风,  
卷起沙土。但却不曾摇曳过,  
那门板隙中透出来的微弱的烛影。

从后来的发展看,《一个老木匠》中的夜之形象,也正是穆旦全部作品中的夜的形象。显然,穆旦诗中的这种黑暗,源于诗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己性关系,它是诗人面对一个不安全与不可信任的世界时生成的源始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穆旦早期作品中“反映人民疾苦”<sup>①</sup>的成分,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异己性感受的自然流露。这种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己性关系,既是诗人自我意识的起点,也是诗人认同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个人”观念的内在契机。

在穆旦早期作品中,世界还有神秘和不可理解的一面。《神秘》一诗,正是诗人对世界神秘性的体认:

你要说,这世界真太奇怪,  
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安排?  
我只好沉默,和微笑,  
等世界完全毁灭的那一天,那才是一个结果,  
暂时谁也不会想得开。

但,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宇宙间本没有什么神秘”,神秘的是人自己。世界的神秘与不可理解,实际上是诗人无法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与方向的体现。这种对自我的位置与身份的不可知,成了《流浪人》的基本处境:

一步,一步,一步……

---

① 殷之、夏家善:《诗人穆旦早年在天津的新诗创作》,见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天涯的什么地方？  
没有目的。可老是  
疲倦的两只脚运动着，  
一步，一步……流浪人。

这个流浪人，并非日常所见的受物质匮乏的压迫而流离失所的流浪者，而是一个苦苦寻找人生目标与方向的精神流浪者。

从艺术渊源上看，闻一多的《我是一个流囚》，很可能启发了穆旦。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种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常见的原型：“寻路者”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原型意象确实如赵园所说，一直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所系，现代作家的激情所钟。”<sup>①</sup>除闻一多《我是一个流囚》中的“我”之外，鲁迅笔下的“过客”（《野草·过客》），戴望舒的“寻梦者”（《寻梦者》），乃至在迷惘的《雨巷》中“哀怨又彷徨”的“我”，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纯祖，等等，都可归入这一原型。

因此，穆旦早期作品，实际上已写出了自我的现代性生存困境：个人被从异己性的世界中剥离出来，抛进了没有方向与目标的黑暗中。而这，也就是现代人最基本的境遇：从传统神义论的世界秩序中挣脱和剥离出来，开始了自己为自己创造意义和秩序的历程。

## 第二节 个体境遇与普遍历史危机

从人类个体心理的发育与成长的角度看，世界首先是作为一个异己性的他者而被意识到的。因此，对世界的不信任和由此而来的焦虑，可以说是个体对他置身其中的世界的本能体验。人类文化实践的根本目标，就是引导人类克服这种原初的本能体验，获得本体性的安全感，使世界变成可理解和可接受的居所。这一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认同过程。

但在穆旦身上，这种认同过程显然受到了阻碍与扭曲。阻碍与扭曲首先来自童年经验。穆旦祖上是明清两代“名满大江南北的望族”，但到诗人

---

<sup>①</sup>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页。

出生时,家道早已经“衰败下来”<sup>①</sup>。诗人的胞妹查良钤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童年经验的基本材料:“那时我们住在天津北马路恒德里老宅内。老弟兄六人,我父亲排六,因记忆力差,一直没有很好的工作,在大家庭弟兄中是不受重视的……处在旧封建大家庭中,父亲因没有本事,这一房人就受气”<sup>②</sup>,诗人因此而自小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冷眼和歧视的环境中,这无疑影响了穆旦对世界的感受,使诗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己性关系从一种本能的自然经验扩展到了社会生活领域。正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反传统思想,便很自然地在穆旦身上体现了出来,与他对大家庭的叛逆意识融合在了一起。据说,“每逢过年(春节)大家庭中要祭祖先,摆供桌,子孙们要磕头,轮到他,他就不磕头”<sup>③</sup>。对穆旦来说,这种融合既是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己性关系的自然延续与扩展,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异己性关系。

从中国现代思想的总体状况着眼,穆旦遭遇到的认同阻碍和扭曲,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缩影。自晚清以降,由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引发的社会危机,从技术与器物领域开始,逐渐扩散到政治生活之中,进而侵入文化思想领域,最终使整个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也丧失了合法性,变成了危机重重的领域。对传统的中国文人来说,仕与隐是生活的两个世界。仕是施展政治抱负的场所,而隐则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一般说来,明代以前的隐,主要隐于自然山水,但从晚明开始,中国文人逐渐在自然山水之外,发现了另一个隐的空间:充满了情趣的日常生活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领域的合法性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危机的最后形式,它抽空了中国文人的安身立命之地,将他们抛进了没有安全感的异己性世界之中。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是在无法借助于传统的文化理念及其实践机制重新建立个人在世界中的居所的情形下生成的一种反应,而不是文化的危机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危机。

中外文学史上,尽管不乏像爱伦·坡这样按照某种预定的诗学观念或

---

① 周骥良:《怀念诗人穆旦》,见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② 查良钤:《怀念良铮哥哥》,见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③ 查良钤:《怀念良铮哥哥》,见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